

胡正

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一卷】

长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

胡正立

立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主编的话

胡正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从抗日革命根据地土生土长起来的作家。近六十年来，胡正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坚持深入生活，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写作，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他的许多作品，如《汾水长流》、《几度元宵》等，既有深刻的主题思想，也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在读者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获得了一席地位。他同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等，都是享誉国内外的“山药蛋”文学流派的骨干作家。他曾担任过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党组书记、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务，对山西省的文艺创作、文艺组织领导工作、培养和扶植文学青年，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集中展示胡正的文学创作实绩，在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领导下，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主持编辑了这套四卷本的《胡正文集》。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花费了较长时间，从作家本人的藏书中，从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查阅了大量资料，反复阅读了作品原文，核对了作品发表、转载、出版等多种

版本，力争减少疏漏。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编辑文集的惯例，多数作品保持了原貌，除一些作品在发表或出版时，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误植或者排印错误的字词句，我们适当作了更正外，有的混用文字如的、地、得和通用文字如甚与什、做与作以及一些方言等，尊重原文用法，未予更改；此外，中篇小说《重阳风雨》和几篇散文，作家本人认为当初发表时比较仓促，这次编文集作了一定的修改；另一部中篇小说《明天清明》则是编文集前刚刚创作出来的。我们是把《胡正文集》作为文学作品集编辑的，因此，他还具有一定数量的新闻报道、工作性讲话、时政性表态等文学创作之外的文字，就不再收入了。

吴孝仁参加了本文集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郁 波 杨 品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

胡正，原名胡振邦，曾用笔名胡今天。一九二四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生于山西省灵石县城内。少年时在县城高小读书。一九三八年九月，参加晋西南牺牲救国同盟会吕梁剧社。一九四〇年夏编入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二纵队吕梁剧社。一九四〇年冬，随吕梁剧社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半年后转入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一九四二年夏到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辑股干事。一九四三年一月回到晋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文化部文艺工作团。一九四三年二月到静乐县二区任抗联文化部长，同时参加武装工作队工作。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碑》，一九九五年由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等单位联合推荐列为抗战文学名作百篇之一，收入作家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短篇精粹》。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民兵夏收》，一九八一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第六卷。

一九四四年二月编入七月剧社第三队参加整风。一九四五年一月到新民主主义实验学校文艺工作团。一九四五年冬到晋西北文联。一九四六年春到《晋绥日报》任副刊编辑。一九四九年二月到《晋南日报》任记者。一九四九年十月随军南下，任重庆《新华日报》副刊组

副组长。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到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毕业后于一九五三年夏到山西省文联，随即到榆次县张庆村生活一年多。一九五五年任《山西文艺》主编，一九五六六年任山西省文联秘书长。

一九五四年四月发表的短篇小说《摘南瓜》，收入一九五六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创作选集》。《两个巧媳妇》收入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短篇小说选》。《七月古庙会》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篇小说选一九四九—一九七九》（二）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一九六二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汾水长流》，曾改编为同名电影、话剧、戏曲。

“文化大革命”中带着全家被下放到灵石县山村插队落户。一九七二年调回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一九八〇年后历任山西省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名誉委员，山西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山西省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一九八八年为山西省作家协会顾问，一九九八年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一九八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几度元宵》，曾收入日本《中国农村百景》丛书。短篇小说《那是一只灰猫》被《小说选刊》选载。近年来写出了中篇小说《重阳风雨》、《明天清明》以及一些散文、报告。

一九九五年离休后，任山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及所属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委员会主任、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目 录

长篇小说

汾水长流 ----- 3

电影文学剧本

汾水长流 ----- 409

长篇小说

汾水长流

第一 章

黄昏时分，杏园堡村的人们刚刚回到家里吃夜饭，嘡嘡的锣声和敲锣人的喊叫声，就沿着街巷响过来了——

“乡里社里有命令，各当一派，你跟谁托干哪”

男女老少都听清。

今天夜里有霜冻。

社员组员齐出征。自带一捆高粱秆，庙院门口来集中。今晚防霜最当紧，为得夏秋好收成。

敲锣传令的郝同喜在村里喊叫了一圈以后，曙光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便背起高粱秆，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村头。大家把高粱秆堆在一起，便整出一个大大的

续续地来到庙院门前的空场上。当人们正抬头看着大槐树树梢的摆动，看着钟楼顶上的月亮和星星，议论着今夜晚的防霜时，忽然有谁高叫了一声：

“嘿，你们看，那是谁赶着牛跑来了！”

人们往街道上看时，只见是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他赶着一头大黄牛，牛背上还驮着四捆高粱秆。那年轻的郭春海，头上扎着一块白毛巾，身上穿一件黑棉袄，腰里系了一条雪白的腰带。身高肩宽，剑眉圆眼。在这月黑夜里，越显出他那青年英俊的姿态。听见人们叫他，他就扬起鞭子，在空中叭啦叭啦的响了两声，那大黄牛也就蹦跳着跑到庙门跟前来了。

年轻小伙子们一见郭春海，就围上来。有的帮着把大黄牛拴到槐树上，有的亲热地说道：

——“哈，咱们支书无论干甚都要起带头作用，人家都带一捆高粱秆，你怎么驮来四捆？”

“海子哥想得也妙，把老黄牛也动员上参加防霜来了。”

小伙子们正围着郭春海说笑，想不到却惹恼了他们后边站着的一个人。这人有三十多岁，上身披了一件皮袄，头上戴着一顶毡帽，在那方圆的虚胖的脸上，一双细眯眯的眼睛，恰似迸开的黑豆荚里藏着两颗黑豆。听到小伙子们夸奖郭春海，心里一阵不舒服，就接着说了一句：

“哼！几捆高粱秆也值当得使牛驮！”

小伙子们一听这怄气话，便立时回过头来，但瞪眼看时，才看见是他们的副社长刘元禄。小伙子们虽然心里不服气，表面上却不好意思顶撞他们的上级。郭春海呢，他

从家里出来时，为了多拿几捆高粱秆防霜，才想出了这个办法；为了使唤牛驴，还和父亲吵了一顿。而今刘元禄却当着众人说这种话，心里自然生气，但又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和他吵嘴。这时，刚巧老社长徐明礼走过来。徐明礼知道刘元禄跟郭春海平素常面和心不和，短不了吵嘴拌舌。刚才县委会来电话通知防霜，他俩还争吵了一顿：刘元禄怕白劳累一夜，劳民伤财；郭春海却说，应当相信气象预报，发挥农业社的优越性，避免减产。因此坚持要防霜。眼下，徐明礼也怕他俩当着众人争吵，便拉着郭春海说道：

“算啦，一句闲话，就当他没有说，你没有听见。天气不早了，人们也来得差不多了，我看咱们就开会吧。”

于是，社长徐明礼就宣布开会，先让乡长张月清讲了几句防霜的意义，随后又说明了今晚上的防霜办法：农业社按生产队分配地段；互助组由组长带领，到村外西北面用高粱秆摆好一排火堆；民兵们集中到庙上睡觉，后半夜以打钟为号，分头去点火熏烟。

社长徐明礼刚宣布完毕，各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就立刻叫喊起来。队长叫社员，社员叫队长。一阵叫嚷之后，各生产队的队长又向社员们分配开任务，指定下地点，然后社员们就背起高粱秆出发了。

乡、社干部们在讨论防霜办法时，便确定了分工。支书郭春海和社长徐明礼领导农业社防霜，乡长张月清领导互助组和单干户防霜。眼下，当农业社的社员们出发以后，张月清检点人数时，看见互助组和单干户来的人太少，便临时又抽调了几个干部，分派去动员互助组和单干户。刘元禄因为兼任着乡武装委员会的副主任，所以张月

清也临时把他抽调过来，并且和他商议道：“你是和村主任他们领导互助组呢，还是和我去督促单干户？”

刘元禄觉得单干户一家一户的不好督促，便说：“我就和村主任领导互助组吧。”乡长张月清便给他分配了督促周有富等三个互助组的任务。刘元禄刚领了任务，就神气十足地独自走了。他想先回一趟家，提一盏马灯。他既然是去作领导工作，而且又是动员富裕中农周有富，那当然就应当提一盏照明的马灯。

一霎时，庙门前的场子上已空无一人。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已经背着高粱秆，按照指定的地点，分头向村外走去。有的是三人一群，有的是两人一伙，也有的是一人一路。郭春海因为驮了四捆高粱秆，所以也是一个人赶着老牛往村外走。一路上，他看着社员们那股欢劲，心里也高兴起来。往年春天遇到霜冻，哪能有这种阵势，一家一户的怎能抗拒住这么大的灾害！办起农业社后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竟使好多农业社员激动起来；有的社员一面走，一面还大声地吆喊着返回家里背高粱秆的人，有些年轻社员们，竟高声唱起秧歌。年轻的郭春海一听那秧歌，也兴奋地响了一声牛鞭，仰起头唱了起来。

郭春海正高兴地唱着秧歌往村外走，耳风里忽听得有谁笑了两声。他定睛一看，怎么竟走到周有富那老顽固的大门口来了！心里一时慌跳，秧歌也唱不出口了。当他正要迈开大步走过去时，忽然又听得有谁叫了他一声：

“支书同志，怎么不唱啦？”

郭春海一听那耳熟的声音，回头又看见那两条长辫子

在眼前一晃，他就心热地叫了一声：“啊，红莲！”杜红莲低声笑着说道：

“我就听出是你来了。”

郭春海也高兴地问道：

“你出来做甚？”

杜红莲却先问他：

“你们干甚去？”

郭春海说：“到麦地里熏烟防霜。”

杜红莲一听说郭春海到麦地去熏烟防霜，就回头看了看院里，院里是黑洞洞静悄悄的。刚才郝同喜敲锣时，她就劝她后爹周有富也去防霜，周有富却说：“什么气象台和广播台，哼！农业社不心疼高粱秆，叫他们熏烟去吧，咱是互助组，咱可误不起瞌睡。”所以全家人早就熄灯睡觉了。但杜红莲听了郝同喜那锣声，随后又听见街上人们来来往往的嚷叫声，想象着农业社社员们到麦地里熏烟防霜的热闹情景，就不想睡觉了。心想：“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他不相信气象预报，自己还能不相信？他不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也跟上他睡懒觉？”再说，杜红莲是多么想和农业社那些年轻人们一块儿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地到地里干活啊！她实在不愿意闷在家里。她正发愁自己一个人怎么去防霜，就听到郭春海那动心的歌声，她便大胆地走出门外，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要求：

“支书同志，我也跟你去防霜吧？”

“你跟我去？”

郭春海倒有些犹豫了。在这黑暗的夜里，他们两个年轻男女相跟着到村外去熏烟防霜，要是给那些封建疙瘩们

看见，会说些什么话？在群众中会有什么影响？让那顽固的周有富知道后，又会对她怎样呢？也许，杜红莲不过是顺口说一说，只要自己一拦挡也就罢了。不料杜红莲却把一双长辫子往后一甩，赌气说道：

“他们不防霜，还能挡住我防霜？刚才老同喜敲锣时，还动员我们出来防霜，你要不想带我走，我就一个人去。”

郭春海见她这样坚决、大胆，说得也在理，便高兴地答应了她。杜红莲也就立时气消云散，笑着看了郭春海一眼，便和郭春海相跟着走出村去。

一路上，郭春海心里一直是热突突的。他们好久没有见面，没有说话了。今晚，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他何尝不愿意和红莲好好地说说话呢！他就和红莲并排走起来。忽然，他的左手一下子碰着红莲的右手。郭春海心里跳了一下，她呢，她却轻声地笑笑，而且也有意用手碰了他一下。可是，当郭春海第二次用手碰她时，她却闪手躲开了。郭春海心里一阵冰凉，刚预备好的几句话语也说不出来了。是啊，自从那年正月十五闹红火以后，只在村剧团、夜校里或遇到什么工作时见见面，也没有说过什么知心话，谁晓得今晚上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杜红莲却仍是仰着一副笑脸，虽然她这时候心里也是热烘烘的，但她还不敢断定是因为参加防霜呢，还是因为相随着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郭春海。自从那年元宵节闹红火以后，她倒是常想见他，见了他心里就觉得快活。可是，这能不能就算是对他有了意思呢？

杜红莲原是南村人，九岁上死了父亲，就跟随上后嫁的母亲到了杏园堡。她长到十五岁，村里人们都夸奖她长

得漂亮。正月十五闹红火时，就选她上了“背棍”。这地方最时兴“背棍”。就是一个男人在背上背一根铁棍，把一个女孩子绑在上面，铁棍由双方的衣服遮掩着，因此看不出来。有时，铁棍从男人伸起的袖子里伸出去，再经过一把扇子或一把旱伞和上面女孩子的裙子的遮掩，就好像女孩子站在扇子或旱伞上一样。男女双方扮演的角色，大都是当地流行的戏曲或秧歌节目，如《打金枝》、《宝莲灯》、《四姐挑菜》、《五哥放羊》等等。在挑选扮演者时，背铁棍的男子要身强力壮，会扭；“背棍”上的女子则要聪明漂亮。每年正月十五闹红火，村里总要挑选几个最好看的女子上“背棍”，而谁家的女子如果上了“背棍”，开春以后，媒人就会踏烂谁家的门槛。那年正月十五选上杜红莲上“背棍”，让她装扮了一位玉堂春。一说要演《玉堂春》，恰巧又打动了敲锣传令的照庙老汉郝同喜。郝同喜一提起《玉堂春》就没命了，他特别喜爱这出戏。别人对于他特别喜爱这出戏虽然也知道一点缘故，却不知道他的劲头会有这么大：他要扮演背铁棍的王金龙。别人都说他年老气衰，怕背不动，他就抖抖精神说：“论力气，不减当年；论架势，在这方圆几十里以内也算个老把式吧！”他非要扮演这角色不行。没有办法，年轻人们就只好直爽地提出：“那就改扮《打渔杀家》的萧恩吧。王金龙是个年轻漂亮后生，你满嘴胡才，一脸皱纹，不相宜。”这一说，虽然他有点伤心，可并没有退让。他就刮了胡须，一股劲往脸上抹粉，像和了泥抹墙缝一样，不顾别人的反对，就装扮起王金龙来。别人看到这光景，也不好意思硬拦挡他。因为这是闹红火的事，而且郝同喜在村里也算个红火人，年轻时候，也确是闹红火的好把式。郝

同喜把铁棍紧紧的绑在身上，人们又帮忙把装扮成玉堂春的杜红莲绑上铁棍。锣鼓一响，郝同喜就像斗活龙一样扭出来。一出庙院门，那些挤着看热闹的人们看见这么标致的玉堂春，还有那扭得欢蹦带劲的王金龙，就叫起好来。有几个年轻人还把手指放在嘴里打开哨子。郭春海当时正在敲鼓，一见这情景，也高举起鼓槌，飘起鼓槌上那红绸穗子，更加用劲地擂起鼓来。郝同喜是经不住夸奖的人，听到叫好，他就扭得更得意、更带劲了，真如一条活龙般扭来扭去。可是，总因为他上了年纪，扭到高兴时，一不小心，腰一闪，足一滑，眼看就要摔倒，“背棍”上的杜红莲也跟着要倒下来。当时真把看热闹的人们惊呆了。但就在杜红莲刚要倒下去时，突然那擂鼓的郭春海一步抢上去，伸手就接住了她。受惊的杜红莲只叫了声“海子哥！”便无力地闭着眼睛，偎在郭春海的怀里……

这以后，杜红莲见到郭春海，心里就觉得亲切、热乎。但他们除了正月十五闹红火，除了五月端午、七月十五赶庙会时见见面，说话的机会就不多了。郭春海不愿意仗着救过她再去找她，她也没有因为这一次的恩情而许下终身心愿。解放后，村里办起了夜校，虽然他俩可以经常见面，但是郭春海还看不出她对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因为杜红莲那火喷喷、热辣辣、喜闹好耍的性情，好像对谁也是那么尽情地开心。这中间竟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对她有了意思。比如夜校散学以后，因为她住的那个小巷里就只她一个人上学，所以每次散学后，夜校教员总要让同学们送她回家。起先是女同学们送她回家，后来那些年轻的男同学们也争着送她。一路上，同学们自然也要说说笑笑。有一次，一个青年送她回家时，故意用肩膀碰了她一